

农业经济和宏观问题研究
——我的学术实践、观点和方法

牛若峰 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者的话

这是我国农业经济学家牛若峰同志的一本文集，主要选自改革开放以来至1992年5月底以前撰写的论文、报告、讲演和建议，包括没有正式发表过的文稿。

通过这本集子可以系统地了解作者在农业经济和宏观问题广阔领域内所作的研究和探讨、学术活动、主要观点和方法特点，特别是作者坚持实事求是，勇于追求真理，勤于独立思考，敢于标新立异的学术风格。

本书内容丰富，涉及范围颇广。作者的观点鲜明，风格独特，读后可以受到启迪；如何在既定环境下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学术探讨，从而作为一位学者跻身于众家之林，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本书适读范围广，可供大专院校师生特别是研究生、经济科学工作者、农业政策研究人员，农业行政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机构的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编者

1992年6月

前 言

1990年入冬时节，天气晴朗，办公室的暖气烧得暖洋洋的。我正在整理文件、书报和底稿，准备卸职交班。整理时，我把近十年来写的札记、文章和报告放在一起，绑成一捆。办公室搬迁后，稍事整理，连同放在家里的，倒有几十篇，是否值得把这些分散的文章和报告整理成册？后来有的青年朋友向我建议把以前写的讲的东西整理成册，贡献给同行们。我为青年朋友的热诚建议所打动，于是着手整理分散的东西。这件工作，包括初选和精选，进行注释和文字订正，断断续续，相继年余，到1992年6月1日终于结集成书。

说实在的，整理分散的东西并非易事。由于当初写什么讲什么的时候，不曾想到往后要出集子，平时没有注意收藏，需要从头回忆和查寻，很费时间。有的忆不起出处，不知散在哪里，只好作罢。青年时代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写的为数甚少的几篇，由于当时的情况未能发表，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落了。因此，这里选入的是1978年9月至1992年5月底以前撰写的文章和报告共58篇。重复交叉较多的文章和报告以及我起草的纯行政性文件如计划、规划和总结等都未选入。独著单行本著作也不在入选之列。

这里结集成书的文稿，一般照原样整篇选入，有的作了必要的删节和若干文字的订正，但均不改动原稿的基本观点。在每篇题下，用几行楷体字交待了本文的背景、目的及其他必要说明。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历史科学。选入的文章和报告都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均有一定的针对性，带有时代烙印。文中的“目前”、“现在”和“近来”都是写作时的时态，而不是本书

编辑出版时的时态。如果读者阅读本书时能联想到当时的背景，则能很好地理解作者的本意，而且肯定会赞同我尊重史实的态度。

关于本书的框架，我想对六个部分的安排作如下交待：

在作者看来，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的细胞单元，全面系统地研究农业经济问题，自然是从研究农业再生产要素投入配置的经济技术合理性做起，这是我把农业技术经济作为本书第一部分的一个原因。

任何社会生产及其要素组合都是以一定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存在和运行的，这是社会生产的微观基础。因此，理所当然地把农业经营问题（包括微观体制）排作第二部分。

同其他产业一样，农业是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而存在和发展的，它虽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但在现代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在国民经济总体战略和整体格局中发展的，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作者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宏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合乎逻辑地把“农业发展研究”升华到较高的层次，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排作第三部分。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决不可仅在书斋里搞研究，除了到国内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走出国门进行考察，就成了作者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外国经验介绍排在国内“农业发展论”之后，即作为本书的第四部分，在逻辑上比较顺。

由于时代背景、作者所处的岗位和个人志趣所决定，作者从不拘泥于农业部门经济学的范围，而是积极地跻身于更高更深层次的“宏观问题”的研讨，于是构成本书的第五部分。当然，这里“宏观问题”仅反映所及问题之宏大，并非严格的宏观经济学术语。

作者作为“双肩挑”式的学者，从事相应层次的科研事业和方法探讨，是义不容辞的业务，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即构成本书最后即第六部分。

上述的编排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也不是内在联系对逻辑结构的要求。

在作者看来，对上述广泛领域的研讨，只是为研究开了个头，结集出版，抛砖引玉，期望人们去作更深入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说，把本书的观点和方法叫做“导论”或许是合适的。

《出版者的话》为本书开了一个较宽的读者对象单子，我以为本书主要是给青年朋友们看的。如果青年朋友们看了，感到有所裨益，那么，我的功夫没有白费，就很心满意足了。

我愿意声明，选入本书的有几篇是我主持或我参与下写成的报告以及我根据本人和同事们的有关报告或材料写成的讲稿，把这些集体劳动成果集中地扩散给更多的读者，或许是有益的。我们研究所的青年朋友向我提出编辑出版本书的建议，给予我以有力的推动和很好的启示。原农业部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可贵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 者

1992年6月1日

迟来的春天，辛勤的耕耘

（代绪论）

我29岁时进入中国农业科学院，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38岁时逢“文化大革命”。许多人年轻时代的宝贵年华被没完没了的“运动”断送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饱经苦难的人民总算盼来了希望。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唤来了科学的春天，然而对于我（时年50岁）来说无疑是迟来的春天。如果它早来十年，那么我的学术生涯或许会丰富得多。让我从头说起。

我的大学

我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河南禹县、开封）和中南局（武汉）做机要工作时，结识了我永远敬仰的邓子恢、杜润生等老前辈，通过文件默默地从他们那里学习写作；工作之余，在机关夜校修读中学课程，渐渐萌发了上大学的念头。多亏邓老的支持，1950年1月我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合作社系，攻读供销专业，同时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济学知识，包括有选择地阅读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学习受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干扰，被临时调出搞运动，耽搁了半年。我对能否专心致志地学到大学毕业产生了疑问。

正在这时，学校告知我一个连想也想不到的好消息：准备赴苏留学。1952年4月进北京俄专二部学习俄语，同年9月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农学院经济系攻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由于我的专业变动，又从第一一年级学起。1957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农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我完成留学学业绝非易事，因为没有上过中学，第一学年白

天上大学课，晚间上夜校补中学数理化，一天需学习15—16个小时，周末和星期日就读于图书馆，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都是在课外攻读的。当时我的心情是：“留学对自己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学好本领，毕业后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效力”。这是激励我克服困难，刻苦攻读的强大动力。我的学习成绩不仅比同班苏联同学好，而且优于别国的留学生，这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踊跃参加院系大学生学术讨论会并作报告，曾获“大学生科研活动优胜奖”。

挫 折 与 机 遇

由于当时的情况所决定，我读完本科未续读研究生，于1957年7月返回祖国。我抱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农业经济研究组任研究实习员，次年农业经济研究所成立后，从事内部刊物《农业经济参考资料》编辑工作。60年代初任国外情报组组长，编译国外农业经济与贸易信息资料，供领导参考。根据社会需要，还翻译或编译一些著作^①。1963年，我晋升为助理研究员。但在那时难以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禁区 and 清规戒律甚多。

1964年4月，我遵照组织的决定并非自愿地被调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室任编译组组长，从事我不熟悉的《农业科技译报》和《农业译丛》等技术编译工作。我对自己的专业依依不舍，挤时间收集编译大量资料，编写成《世界一些国家农业经济

① 牛若峰编译：《论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其计算方法》（农业出版社1959年11月），独译《苏联集体农庄经济若干问题》（农业出版社1960年5月），合译《土地经济评价》（农业出版社1960年4月）。

概况》书稿（约35万字），由于国际风云变幻而未能出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火化升天了。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我出身贫寒，自幼吃苦，对清贫的生活倒是无所谓，但令人忆往生畏的是政治困惑。第一个深感痛苦的事是60年代被列入“另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更是惨不堪言。那是不凭事实，不讲道理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我国上层正在酝酿对西方开放，这对我们个人不无影响。当年2月，我从“五七”干校回到离别三年的北京，被安排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农业科技通讯》编辑组，先做编务杂事，后做编辑和副组长，为向农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促进农业增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四人帮”倒台后，全国科学大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为我的科研生涯带来新的机遇。1979年4月，我回到离开15年之久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才真正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并参加研究所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先任所领导小组组长，1981年10月任副所长，1983年2月任所长，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于研究所的建设和管理。

学 术 研 究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重点研究农业技术经济。针对我国长期不讲究经济效益的倾向，系统地研究了农业生产经济效果的原理、内涵和计算方法，详细论述了农业生产各要素投入的合理界限和经济效果的衡量，以及可供广泛应用的指标体系，1978年写成《农业生产经济效果概念和计算方法》^①一书，出版后一销而空。

^① 农业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针对当时的农业现代化热和机器进口风，1979年5月我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化技术经济讨论会上发表论文指出：

“进口外国农业机器的目的，主要应当是作为选型仿制的参考样机，用进口高效率低消耗的机器设备装备若干实验基地，也是为了选型和摸索现代化农业的管理经验”，认为“象我国这样条件十分复杂的大国，靠进口机器搞农业机械化是化不成的；长期推广使用昂贵的外国机器，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我说，马克思关于“使用机器的一般经济界限，对于社会主义依然是适用的”。在谈到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指标时指出，“高度的土地生产率和较高的按人口平均农畜产品占有量”，与“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同样重要”，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地多、生产水平很低的国家，强调提高土地生产率更为重要”^①，后来我这种看法发展成为“我国应当实行以土地替代型为主和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技术创新路线”的观点。

1980年1月晋升为副研究员，并任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在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形成的初期，一度发生这样的争论：农业技术经济作为独立的学科是否成立，它与西方的农业生产经济学有何区别。为此，我于1983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学术讨论会上以“农业技术经济是一门新兴学科”为题发表论文^②，系统地论述了这门新学科的对象、内容和任务，从微观和宏观角度阐明了它的作用，较早地把“经济效益原理、资源平衡原理、边际均等原理和价值转移原理”看成“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准确地说明了它们的内涵和应用范围；着重从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立论的社会经济基础、研究对象和目的、原理

① 牛若峰：《有关农业机械化经济效益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参考资料》1979年第11期；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农业现代化参考资料选编》第6集（1981年12月）。

② 见中国农业经济学会技术经济研究会、农牧渔业部经营管理总站：《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实践》（1983年12月）。

和方法等八个方面，论证了农业技术经济学与农业生产经济学“虽有交叉和相似之处”，但“它们是互相独立的学科，在许多根本方面并不相同，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融合为一”。我的一些观点对农经学界达到共识起了作用，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形成作出了一点贡献。

1981—1983年，我作为第二完成人参加农牧渔业部委托课题“农业科研成果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何桂庭主持），着重揭示了农业科研劳动的特点及其价值增殖和实现的机制，阐明了农业科研投资效用的滞后性、科研项目安排的超前性、适量增加科研投资的及时性与农业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关系，以及农业科学研究在农业技术进步总贡献率中应占份额的理论根据。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设计的农业科研成果经济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在全国农业科研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此项成果获1983年农牧渔业部农业技术改进壹等奖。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以我为主编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和利用的经济评价》专著^①，填补了农业技术经济中的一个空白，并为我国农业科研经济学奠定了初步基础。

“六五”计划期间，我把重点转移到农业发展研究。

1982—1984年，参加“我国粮食和经济作物发展综合研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卢良恕、刘志澄主持），除参与项目管理外，主要研究了粮食生产发展阶段、经验教训、影响因素和宏观政策。此项成果被国务院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所采纳，荣获198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贰等奖，我被列入“做出重要贡献”者之一。

1979—1984年间我国粮食连获丰收，许多人头脑发热，以为粮食“过关”了，有的提出要“甩掉粮食包袱”。我作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农业专题组召集人同苗复春于1984年10月25日

① 农业出版社1985年3月第一版，1987年3月第2次印刷。

召集在京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专门讨论。我在发言中指出：“近年出现的卖粮难，是低水平的相对剩余，是暂时现象”，短缺才是长期趋势。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粮食是国家的命脉，是牵动全局的战略物资，是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制约因素”。“粮食问题必须以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万勿头脑发热，掉以轻心”。我在分析了粮食形势后颇有预见地指出，“要看到……某些不利于粮食稳定增长的势头”，“粮食连续高速增长将要过去”，并从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省际间合同供销、发展食品加工和饲料转化、加强交通运输和储藏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五点对策，强调要“保证粮农利益”。^①

1985年我国粮食大减产后，有人主张“要多进口粮食”，我针锋相对地指出，“平衡粮食供需矛盾主要靠国内增加生产和建立粮食安全储备。长期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切实际的”。^②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粮食安全必须系在本国基本自给上，绝不可系在进出口上，后者只是调剂余缺的辅助手段。

1983年下半年起参加“2000年的中国”的研究（国家“六五”计划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马洪为总主持人），我作为“2000年中国的农业”报告的负责人，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合理的框架设计，主持完成了研究任务。^③在此基础上写成专著和农村读物。^④1984年6月19日在内部谈到该项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我和周维特别强调指出：（1）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不

① 牛若峰：《关于食粮的形势和对策》，见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办公室《技术经济参考资料》1984年第36期。

② 牛若峰：《2000年中国的粮食问题》，1987年10月在国际农村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上的论文（国内外发表）。

③ 见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之六（1984年12月）。

④ 牛若峰主编：《2000年中国的农业》，1987年10月签署三校，出版社延误出版；《2000年中国农产品需求与农业发展》，科学普及出版社1989年10月。

能抄袭别国的模式。(2)农村经济的方向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合作经济为主体。“必须使大多数人得到经济实惠”,防止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3)“必须采取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注意CNP的质量、内容、结构,必须考虑环境、资源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4)改革开放将会导致不同经济成分、精神、道德之间的竞争。因此,我特别强调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西方的消极现象可能增加。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民族文化传统将以怎样的形式和多大的威力去抵制各种消极现象,这取决于它们与现实生活的成功结合,使青年一代乐意接受的程度”。^①这些话不无预见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2000年的中国为中央、国务院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获198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壹等奖,我作为“做出重要贡献”者被授予获奖证书。

1986年12月晋升为研究员,随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80年代后半期我国粮棉生产出现徘徊,一种观点认为是“超常规增长转入了常规增长”,有的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来解释,有的甚至归咎于家庭承包制的局限性。我却不以为然,用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与上述流行观点相对立,系统地研究了农业增长波动,指出“阶段性波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认为1979—1984年农业高速度增长和1985年粮食大减产以及随后的粮棉生产徘徊,正是长期增长波动中出现的升降,我把政策变动看成是我国农业长期波动的主因,而矫正工业倾斜战略则是农业转向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连续发表文章^②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我总结了新中国农业体制频繁变动

① 牛若峰、周维:《2000年中国之研究和农业科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参考资料》(1985年1月25日)。

② 见《农业经济问题》1988年第10期,《科技导报》1989年第4期;何康、王郁昭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十年》(征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

的经验教训，指出“激进的农业集体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微观基础，家庭承包制则重建了中国农户经营，从而使农户获得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土地承包到户是“只完成了一半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化改革“要完成另一半任务”，诸如产权界定、组织、制度建设，使之适应于商品经济大市场的要求。我主张我国农业“走坚持土地集体公有，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经济为主导，多种模式，集约高产，持续发展的道路”。^①在社会上引起共鸣。

“七五”计划期末，我把农业发展研究拓宽到中国工农关系研究（农业部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委托课题），与青年学者郭玮、陈凡合作，把农业问题放在国民经济宏大背景下，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工业化起步和推进阶段的工农关系，历史地考察了农业发展的曲折路程，进一步揭示了农业增长波动规律和以重工业优先为中心的经济偏斜运行轨迹，提出了我国经济偏斜循环周期理论，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农业问题的深层根源。报告以实证分析证明，“由于长期执行工业偏斜发展战略，工农业的发展总起来看是不协调或不均衡的。……农业总是服从于或服务于国家工业化……，除了调整时期外，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受损过重过长”，“潜伏着危机”。我把发展新时期的工农联盟与国家命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一再呼吁在各层次建立农民利益代表机构，扩大农民的发言机会，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②。

我等以雄辩的实事证明，我国国家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已经过去，步入了中期发展阶段，着手从经济战略和政策上解决工农之间利益矛盾的条件具备、时执成熟，提出分三个阶段走出偏斜循环的战略选择和配套的体制、政策和措施，展望了90年代工农业协

① 见《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4期，《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7期。

② 牛若峰、郭玮等《中国工农关系研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1991年8月）。

调发展的目标、对策和前景。现在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率低是体制、结构和质量问题，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来解决，以任何理由继续牺牲农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

我主持完成的此项研究成果和在其基础上写成的专著^①，对于国家调整经济战略和贯彻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方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为建立中国农业发展经济学奠定了开拓性基础。部分内容摘要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的重视。

此外，我还参加了“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重大项目，卢良恕、刘志澄主持）。

我的价值观

我虽是部门经济学研究者，但从不拘泥于农业经济范围，兴趣颇广。我曾密切注视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改革，应邀到一些单位作报告和发表文章，反复强调我们现在进行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转换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我非常拥护邓小平关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科学论断，非常拥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认为，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防止公有财产私有化、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和社会发生两极分化，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地位，仍然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容忽视的至要问题^②。

我称不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甚至有一阵子似乎马克思主义不那

① 牛若峰、郭玮等：《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 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体制改革潮流，1986年5月在全国中青年农村经济讨论上的报告；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再认识；再谈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再认识，见山西《农村发展探索》1987年第4期和第6期。

么时兴的时候，我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系统地重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①中，举出十个方面的基本观点对于今日社会主义经济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我并不拘泥于前人作出的现成结论和“主流观点”的提法，喜欢独立思考，直抒己见。例如前几年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时，我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两个不同层次概念的混合，带有过渡性；也不赞成有人主张“完善”双轨制，而是要深化体制改革，凭借“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逐步由双轨制平稳过渡到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学会理论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样，要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洋为中用”。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注意保留华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华，继续发扬社会主义公德。我们应当在华夏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结合中，创立中国自己的实用经济学。希望青年学者们多多努力。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从年轻时就跟杂志结下不解之缘。我办刊物喜欢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坚持自己的风格，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不喜欢对我本来并未做错的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同时，通过刊物，我得以了解学术动态，广交朋友，吸纳新知，受益匪浅。

耕 耘 之 果

我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最大乐趣是读书和写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发表独著、主编和与人合著的专著以及工具书共14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多篇。例如，《农业生产经济效果概念和计算方法》，《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利用的经济评价》，《中国农村

^① 1990年9月，在全国高级农经师研讨班的报告，广西桂林。

发展新阶段：问题和探讨》，《2000年中国农产品需求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偏斜循环与农业曲折发展》，大型工具书《农业技术经济手册》和《农村经济手册》等，都是1980年至1991年间出版的。

培养人才是我辛勤耕耘的重要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我带培的几位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生，都是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现在他们都已成了各自岗位上的骨干，正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贡献才智。

与此同时，我为传播农业技术经济知识和农业经济科研成果，提高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的素质，经常应邀写文章作报告，做了大量启蒙和培训工作。这也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而且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把我推向社会，推向世界。学术性兼职，国内外活动日多，逐渐有了一点名声。尤其在青年学者中结交了许多朋友。我多次出国到美国、加拿大、日本、波兰、匈牙利、前苏联等国进行考察访问，多次在国内外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论文，并结交了许多国际朋友。我热衷于推进海峡两岸农业经济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到本书发稿时为止，我可能是在台湾农经界中朋友最多的人之一。

我 就 是 我

80年代担任研究所领导工作期间，我既是管理者又是研究者，算得上“双肩挑”了。因此，我自然有双重特点：（1）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所的管理包括内外应筹上，同时挤时间读书、看材料、搞研究，不敢稍有放松；（2）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赤诚待人，秉公办事，尊重同仁们的正当权益，尽益为别人创造发展机会，从来把所长权利看作是履行职责的工具；（3）特别爱才，热衷于培养人才，对青年人严格要求，同

时乐意助人，宽以待人；（4）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刚直不阿，读书不唯书，尊长不唯上；（5）勤于耕耘，博览多采，热心合作，工作认真，亲自动手，并虚心向一切人学习长处，不断充实自己，更新知识；（6）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研究课题，抓住关键，重点深研，力求有预见性。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心地单纯，性格直率，襟怀坦荡，同我打交道尽可直来直去。可能是因为出身贫寒和从未做过“官儿”，至今仍保持着与最底层人相通的朴素感情。我最憎恶的是以权谋私和口是心非。最容易引起我愤慨的是那些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我最害怕的是自己在学识上落后，最喜欢的是安静地劳作。我从未总结过做人和治学的经验，但我一直恪守自己的座右铭：

正直是做人的道德，
宽容是与人共事的哲学，
勤奋是求知的诀窍，
认真是工作的守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同所有的人一样，自然是有许多缺点的。急躁、独立的个性、思考和劳作时过分的专一，使人难以接受或不理解。太直或“过分”认真，都容易得罪人的。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一直尽力工作而从不索取，问心无愧。如果说我有点儿傻气，那或许是爹妈和环境造就的，不怪天不怪地。我就是我。

我用这么多文字写自述，绝无自我炫耀之意。我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贡献微不足道，一切归功于党的培养，归功于集体的辛劳。

1990年底，我辞去了所长职务，我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晚年在学术上和人才培养方面能有新的作为。

（1991年5月根据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的约稿写成，1992年4月补充修订）